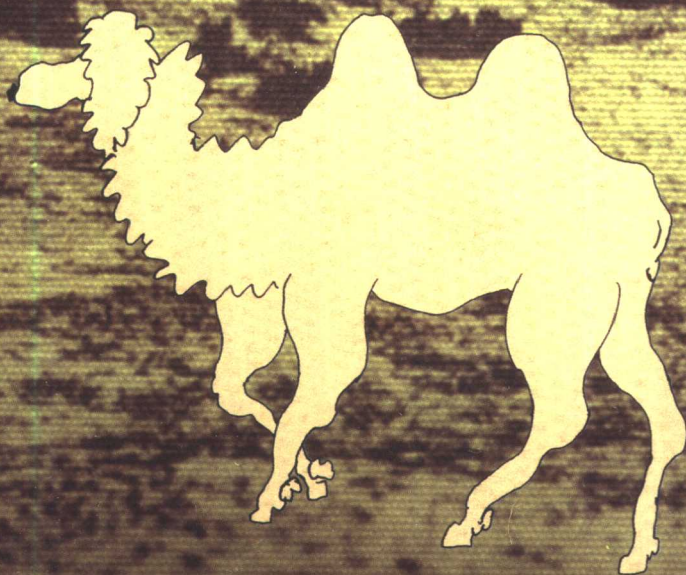


伯希和 西域探险记

[法]伯希和等著
耿昇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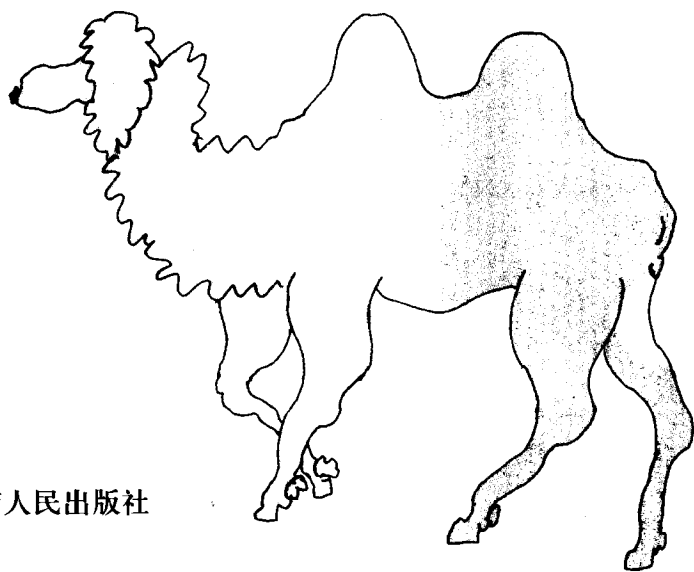
西域探险记



伯希和 西域探险记

[法]伯希和等著
耿昇译

耿昇 主编
马大正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法〕伯希和著；耿昇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

（中国大探险丛书/耿昇、马大正主编）

ISBN 7-222-03187-1

I. 伯... II. ①伯...②耿... III. ①西域—探险

②西域—考古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790 号

中国大探险丛书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

著 者 〔法〕伯希和等

译 者 耿 昇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鞠洪深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2-03187-1/Z·396

定 价 35.50 元

前 言

马大正

19 世纪中叶以后，在日趋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中国危机四伏，清朝统治者既无法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也无力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强盛一时的清王朝的衰亡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考古探险热潮。在加紧侵华的大背景下，众多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纷纷涌入中国，进行考察和探险。他们每个人所抱的目的不同，方法各异，但正是在这些探险考察活动中，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批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相关札记和游记。今天，人们面对这样一份值得研究的历史资料应如何正确认识和利用呢？

首先，有相当一部分的考察报告是当时的现场实录和实地测量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对那些一经破坏性发掘后即被西方殖民者洗劫一空或历经战乱已荡然无存的中国古代文化遗迹来说，这些记录就越显珍贵，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有着基础材料的重要价值。

其次，大量的札记、游记类作品中，尽管有的因作者政治观点和立场不同，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有的因行色匆匆，道听途说，对事物的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由于作者是当事人或同时代人，他们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对当时当地的社会风貌、民族民俗、宗教、地理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描述和记录，仍为人们从一

个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史料。

第三，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外国探险家们在中国的考察活动，曾是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侵略的一项内容。因此作者在记述中有意无意都涉及到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有的更直言不讳对中国资源、文物的劫掠和盗窃，这就为帝国主义侵华史中那段令国人深感屈辱痛心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长期以来，这些相关著作或因深藏国内外书库而难以觅见，或因涉及多种文种而不易为人们阅读，难以为研究者所利用，更无法进入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了迫切需要利用此类图书的研究者和关心此类题材读者的遗憾。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推出“中国大探险丛书”正是为弥补这种缺憾，为让更多的读者利用这份历史资料创造条件。

“中国大探险丛书”选题范围以19~20世纪上半叶外国来华各类人士所撰的报告、游记、笔记为主，包括整个中国的范围，侧重于中国的西部；

“中国大探险丛书”只收探险者本人亲历纪实，内容力求客观、真实，并兼顾知识性和可读性；

“中国大探险丛书”译文力争信、达、雅，一般不作删改，以保持原作风貌；

“中国大探险丛书”每种选题均邀请译者或专家撰写一篇导读性前言，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生平、著作写作背景以及本书的价值所在。

外国探险家有关中国的考察实录近年汉译本已不在少数，我们由衷希望本丛书能为读者扩大阅读面提供一个新的侧面。

果若如此，斯愿足矣！

2001年3月31日

于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 2 —

2004/6/09

译者的话

敦煌藏经洞的开窟、敦煌文献的发现和敦煌学的诞生，已经 100 周年了。我国西域与敦煌历史文物和文献的外流，则有 100 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险、考古学家们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国探险家、语史学家、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则颇为引人注目。本文试对伯希和西域探险团在我国新疆和甘肃各站，尤其是在敦煌从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钩沉。

一 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缘起

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中亚（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其实，俄、英、德、瑞典、美、芬兰等国进入西域并从事科考探险的时间，要比法国早一些。西方列强在西域探险问题上，也如同在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一样，始终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大英帝国借助于在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在新疆叛乱的机会，首先妄图染指我国新疆，于 1834 年派遣沃森（W·H·Wathen）赴于阗进行考察，约翰逊（W·H·Johnson）于 1865～1866 年考察于阗，沙敖（R·B·Shaw，邵乌）于 1870 年考察叶尔羌与喀什，弗赛斯（T·D·Forsyth）及其同事们于 1873 年考察喀什与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英国探险家贾斯理（Carey）和达尔格莱斯（Dalgleish）稍后于 1886～1887 年也前往同一地区，鲍尔（Bower）少校利用一次追捕杀害达格莱什的逃犯的机会而于 1889 年到达沙雅。但这些英国人直到此时仍未考察清

楚，究竟应将塔里木文化归属于哪一种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于 1900 ~ 1901 年进行第一次西域探险为止。

早就对中国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国，更是不断地派遣文武官吏对塔里木盆地南缘与喀什地区进行考察。如普热瓦爾斯基 (N·M·Prževal'skij) 于 1870 ~ 1885 年 4 次分别对罗布泊、且末和阿尔金山诸绿洲的考察。1885 年，格伦伯切夫斯基 (B·L·Grombëcevskii) 在塔里木盆地西缘从事考察发掘。1889 ~ 1890 年间，佩夫乔夫 (M·V·Pevcov)、罗博罗夫斯基 (Roborovskii)、博格达诺维奇 (Bogdanovič) 和柯兹洛夫 (P·K·Kozlov) 分别对喀什、天山南麓、叶儿羌河上游地区作了考察，帝俄驻喀什领事馆秘书雅·雅·鲁特斯 (Ya·Ya·Lyuts) 搜集了一大批古文献并入藏于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贝林格 (Belinko) 和帝俄驻喀什领事科洛科洛夫 (G·Kolokolov) 则将其搜集品入藏于帝俄科学院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帝俄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根据 1891 年 11 月 28 日的会议纪要，而向彼得罗夫斯基发去了一份有关在喀什地区从事考古发掘和科学考察的调查提纲。帝俄皇家科学院与考古学会，于是在 1897 年派出由克莱门茨 (D·A·Klementz) 率领的考察团赴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从事发掘工作。

瑞典人斯文·赫定于 1890 ~ 1902 年间 3 次赴西域进行考察。由格伦维德尔 (Grünwedel)、胡特 (Huth) 率领的德国考古探险团，于 1902 ~ 1903 年首开 4 次西域探险之行。由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率领的第一个日本大谷探险团也于同时到达塔里木盆地。

这些考古探险团都大肆地非法发掘、收购、盗窃了大量中国文物，以丰富他们各自国家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

在西方和日本争相向中国西部派遣考古探险团的热潮

中，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和尤为注重文化侵略的法国却姗姗来迟。但在 19 世纪下半叶，也有几名法国旅行探险家进入过西域。如博安（C·E·Bonin）于 1899～1900 年、吕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于 1889～1894 年、沙畹（E·Chavannes）于 1907 年、古伯察（E·-R·Huc）和秦神父（Joseph Gabet）于 1843～1845 年，多伦（d'Olone）于 1906～1907 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奥尔良（Henri d'Orléans）于 1895～1896 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点旅行探险。虽然法国在西域考古探险起步较晚，人数较少，但也劫掠了不少文物与文献。因为等到法国考古探险团远涉西域时，那里的几大重点考古发掘地点（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于阗）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捷足先登了。

西方列强在西域的科考与探险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对文物古迹的竞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为了在西域从事更加系统而广泛的考察，分工对几大重点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决定统一协调这方面的工作。1890 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决定组建一个“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1902 年在汉堡召开的新一届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最终组建起来了。其总部设在西方列强中离西域最近的国都——俄京圣彼得堡。在国际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惯用的划定势力范围的老伎俩。

西域国际考察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会，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1847～1928 年）任主席。塞纳尔出身于豪门富户，终生酷爱学术。他年轻时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别是“北宗佛教”的吸引，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学家。他曾出版过有关巴利文语法、印度文碑铭、印度种姓制度、《正法华经》和《大事》（Mahavas-

tu) 的研究论著。他从 1882 年起便当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士，同时又受聘为意、比、荷、俄、德诸国科学院的院士。他担任法国亚洲委员会主席一职近 30 年，曾大力推动筹建法兰西远东学院，也曾参与组织法国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动，当时正任法国地理学会主席。所以，正是他提议和推荐派遣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率团赴西域考察。

法国的既定目标就是，在这场激烈的国际大竞争中，法国必须占有与其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额。伯希和中选是由于他学识过人，又富有在亚洲活动的经验，精通几门亚洲语言和拥有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识。该团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队的军医、原交州（东京湾）人路易·瓦杨（Louis Vaillant）博士，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负责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工作。整个探险团所需大部分资金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赞助。诸如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史博物馆那样的一批学术团体，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纳尔先生本人那样的一些热衷于赞助文化教育事业的人，也都慷慨解囊。奥尔良基金会的一笔逾期未付款也被划归伯希和支配，从而使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置于一位大旅行家的名誉保护天下。其实，伯希和于 1901 年刚从越南西贡医院出院的那天，奥尔良王子于同一天逝世于同一家医院，真是一种巧合。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组建起来并出发赴西域，进行了近三年的活动。

二、伯希和探险团首战喀什地区与图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一经组建，便立即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他们在人员、资金、和设备方面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多。1906 年 6 月 15 日，伯希和一行离开

法京巴黎，走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险之路。他们先乘火车，经过 10 天旅行后便经莫斯科和奥伦堡，到达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们在塔什干停留了 1 个多月。这是为了等待其从圣彼得堡用船运来的大批行李设备。

伯希和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以学习东突厥语。因为作为语言学家的伯希和，过去只从书本上学习过这种语言，而缺乏实际应用的机会。

伯希和一行乘火车前往安集延，他们一路上沿富饶的费尔干纳河谷前进，那里盛产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宝藏。8 月 11 日，他们到达距安集延只有 10 多公里的奥希 (Och)，最终下了火车，开始组织赴喀什的马队。沙俄地方当局为他们找到了可供雇佣的哥萨克护卫队。卫队长是芬兰裔男爵马达汉 (Emil Mannerheim)，此人于中途告别伯希和而独自从事考察。他于 1939 年出任芬兰军队的元帅，于 1944 年又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当时他是奉沙俄的命令，赴中国西部刺探军情和掠夺文物的。后因十月革命而无法返俄，只好回芬兰。他们结队而行，一直到达喀什。马达汉实际上是利用伯希和探险团作为自己进入中国的掩护和为此而提供方便。沙俄当局也正是以此为条件，才为伯希和一行提供各种方便和两名哥萨克人做护卫。这两名哥萨克人一直陪同伯希和等到达北京，其主要任务是当伯希和一行从事考察而远离营地时，负责看管行李物品。

伯希和一行于 1906 年 8 月间，率一支由 74 匹马组成的马队出发，仅供驮行李的马就多达 24 匹之多。他们经过塔尔迪克达坂 (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尔克孜牧场前进，曾与阿尔泰山地区的柯尔克孜女王公之子阿萨姆 (Assam)，有过一次颇具学术味道的交谈。他们最终从伊尔凯什坦或休循 (Irkechtan) 越过俄中边界。再经过 20 天

的旅行，最终于 1906 年 9 月 1 日到达喀什。这是他们计划中于中国从事考古发掘的第一站。

在喀什，俄国驻喀什领事科洛科夫，将伯希和一行安排在俄国领事馆的一座建筑物中。英国驻喀什领事马继业（Macartney）公爵也经常去拜访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驮队。瓦杨声称，伯希和在俄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中，都很有“面子”，这是由伯希和的渊博学问和丰富的语言学知识所赢得的荣誉。

由于其他国家的考古探险团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活动过，所以伯氏一行只在那里作了一次人类学调查。此外，他们还从事地理调查和对道路进行测绘。

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 6 个多星期，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喀什东北约一月行程的库车绿洲。在他们到达喀什时才获悉，德国人刚在库车作过发掘，俄国人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也曾在那里逗留。但在 1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分别从地理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该地区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 4 个点上。

有关喀什周围的前伊斯兰教遗址。距喀什北部 15 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丝路上喀什的一处名胜。曾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和宁，于嘉庆九年（1804）所纂《回疆通志》卷 7 记载说：“回城北三十里上下……有清泉，甚甘冽，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洞中置石仙像。”这就是著名的三仙洞。在伯希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国的勒柯克都曾对这里作过考察。但不知为什么，伯希和始终称此地为“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误听而造成的。伯希和于 1906 年 10 月 10 日从喀什发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他的这次考察结果。三仙洞位于从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 15 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经的地面上，于黄土高坡上开凿了三眼洞。其土著名称是 Uich—meravan 或 Outchmah—

ravân。Utch 意为“三”，outchmah—ravan 意为“正在坍塌的和难以进入的洞子”。在伯氏之前，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撰文描述过“三仙洞”的欧洲人，是俄国探险家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ii），其描述文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的《论丛》第7卷中：《喀什附近的一处佛教古迹》。彼得罗夫斯基为配合其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从大路一侧拍摄的三仙洞照片以及他绘制的一幅平面图。德国格伦维德尔探险团于1905年考察该洞时，巴尔图斯（Bartus）曾从山崖上用绳索滑入洞内。斯坦因第二次西域探险时，只作壁上观而未进入洞中去。更富有探险精神的伯希和却率瓦杨与努埃特，共同用滑车攀上了三仙洞。他们发现洞内的烧陶层是在原层被剥落之后，重新贴上去的。这应该是1815年的重修层。装饰和绘画风格都是汉地式的。洞中原来收藏的箭矢和木简，均被彼得罗夫斯基的卫队长带走了。洞中写满了游人题记，其中有汉人、蒙古人、满族人和突厥人等。这大体上反映当地民族的构成。赴三仙洞参观考察的人具有各种不同信仰，除了汉满两族人之外，其余几乎全是兵勇。信佛者在这里有他们的“佛祖”，伊斯兰教徒则以摧毁佛教供像来实现自己的虔诚善业。木简证明这些洞子是于嘉庆二十一年九月（1816年10~11月），由清朝将军下令修葺的。最早的游人题记写于1788年。所以，三仙洞的装饰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18世纪平定新疆之后完成的。因为涂层上写有比绘画更古老的题记。

伯希和继瑞典传教士霍贝克（Hökberg）之后，也介绍了三仙洞的开洞原因：当一位不信教国王统治疏勒时，众仙预言其公主将来会被蛇咬死。焦虑不安的国王令人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三眼洞，以将公主安置于其中。他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后来有人瞒着国王，给公主递上去一筐水果，毒蛇藏匿于水果中，公主果然如同诸仙预言的那样，被蛇咬死了。其实，类似的故事在西域流传甚广，

并非独指三仙洞。努埃特拍摄了现在很少见的几幅三仙洞的照片，瓦杨对洞子作了全面调查，详细记录了洞口、中部、后部和左、右部各自的长度、高度和宽度。他还记下了洞内壁画内容，并录下了壁画题识和游人题记。事实上，考察三仙洞是伯希和西域大探险的一次演习。

在三仙洞以东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玛克（Tchâqmâq）河南岸，便是图古曼（Tegurman）遗址。伯希和将该遗址考证为“水磨房”。彼得罗夫斯基未曾提到过该地区。1905年的德国探险团和1906年的斯坦因却都曾指出过它。斯坦因将该地名记作 Tigharman，后又改作 Khakan - ning - shahri，意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证清楚这个“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险中使用的地图上，却作 Khanlya，意为“汗城”。伯希和认为该遗址群系由佛教时代（似乎是由窰堵波和南墙保护的四边形建筑）和伊斯兰时代（西部的“炮台”以及介于炮台和四边形建筑之间那座尚未被考证清楚的建筑）。伯希和亲自率领10名民工，对水磨房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陶片和一个铜铃。

在从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尔古汉城之间大道的左侧，便是“旧城”，或“古城”（Eski - chahr）遗址。彼得罗夫斯基从未讲到过此一地，斯坦因对它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而已。伯希和认为应将它断代为穆斯林时代，但却显得相当古老。伯希和未对它作详细描述，只拍摄了一批照片，并绘制了平面测量图。

对于喀什东北的汗诺依（Khan - òl, Khan - üi），也就是“汗宫”的著名遗址，伯希和作了重点发掘，特别是对其中“鸽子窝”（Kaptar - Khana）、萨喀尔墙（Saqal Tam）和哈萨墙（Hasa Tam）、“九间房”（Toqqouz - Hod-jrah）等重要考古点，都作了发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尤其是他还发现了一处尚未有人考证过的佛

教遗址，发现了佛像残片及几枚钱币。

对于喀什绿洲的前伊斯兰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对 3 个古遗址作了考察发掘。

第一个发掘点是“库尔干宰堵波”（Kourghan Tim），伯希和又称之为“库尔干墙”或“库尔干炮台”。斯坦因曾对该遗址作过考察并作了不太详细的记述。

第二个考古发掘点是红山（克孜勒—戴卜，Qyzyl - Debe），位于克孜勒苏河的故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苏与土门河（Tümen）的交汇处只有 3 公里远。

第三个是“小山”（Kichik - Debe），位于红山以西。

对于喀什地区的佛教遗址，伯希和考察了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âch）等处。伯氏特别是于炮台山作了两天发掘，在帕依纳普村发现了一个所谓的阿布达尔人（Abdal）的小聚落。

1906 年 9 月 26 日，伯希和探险团离开了汗宫，取道东南方向，前往墩库勒。那里是距汗宫有 6~7 公里的一片小绿洲。9 月 27 日，他们前往阿克噶什，在那里发掘了克孜尔炮台（Qyzyl - Tim）以及朶哈炮台（Qaqha Tim，Tim 指“墙”或“宰堵波”）。

伯希和在喀什地区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价值有限，虽然它们都是绝无仅有的。如在炮台山发掘到一只巨耳造像。此外还有某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烧陶物残片。所有这些文物现均收藏于吉美博物馆。

三、伯希和探险团在图木舒克的惊世大发现

经过在喀什地区 1 个多月的勘察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 1906 年 10 月 26 日离开该绿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Ördeklik，野鸭地），在那里搜集到几种罕见的玉器残片之后，于该月 28 日到达玛喇尔巴什（Maral - Bachi，今之巴楚）。他们于 29 日到达图木舒克并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

当年 12 月 15 日，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惟一的一处佛教大型遗址群，因为在图木舒克村不远处，有一片完全被湮没的遗址。斯文·赫定认为它是伊斯兰时代的遗址。伯希和在该遗址中仔细地搜寻任何一种可为古建筑断代的标识。当他用马鞭梢无意地扒拉地面时，便发现了一个属于希腊—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是诞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过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缓慢地从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而传入中国中原，乃至远东的日本。新疆是这种传播中的一个大站。图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 1000 年的佛教僧伽蓝遗址。这是在伯氏之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和指出过的事实。该遗址事实上应被称为托古孜—萨莱或托乎孜—萨拉依（Toqqouz - Sarāi，意为“九间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组织民工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这项发掘工程以每天使用 25 ~ 30 名民工的发掘速度展开，共持续 6 个星期。他们对该遗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测绘，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残片、几种奇形怪状的陶器。他们在发掘后期，还发现了一块类似浅浮雕陈列馆的地方，浅浮雕虽已变得坚硬易碎和残损严重，但仍不失其宏大气魄。它们揭示了在 7 ~ 8 世纪期间，把中国西域与由印度—斯基泰国王统治下的犍陀罗艺术联系起来的纽带。伯希和发掘到的文物，运往法国后先在卢浮宫展出，后又入藏吉美博物馆，曾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轰动一时。

1906 年 9 月至 12 月 12 日之间，伯希和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

图木舒克（Toumchouq, tumšūq）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鸟喙”，后来用于指岖崎不平的地势，具有指“岬角”的意思。图木舒克村庄也确实向南于喀什河与叶儿羌河的沼泽山谷方向延伸的岬角。此地即唐之拔换城或跋禄迦（Barukha）之故地。在 18 世纪时，则是指从南部的麦盖提

(Markat)到北部的启浪之间的整个巴楚(Bartchouq)地区。此名相当古老,在穆斯林突厥人进入之前,它被用于指在玛喇尔巴什地区所操的两种近似于阆语的方言:一种为玛喇尔巴什方言,另一种为图木舒克方言。“图木舒克”这个地名既未出现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甚至也未出现在米儿咱·海答儿的《拉失德史》(1541~1547)中。这是一个突厥文名称,但它似乎曾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出现过,作 Thum - šuk。德国考古学家勒柯克曾将该遗址断代为4世纪末或5世纪初。伯希和于1923年在《通报》中发表的书评指出:“我确实认为,图未舒克是中国新疆,至少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最古老的佛教遗址之一……但我觉得应将勒柯克教授提出的断代时间推迟1~2个世纪。”最后,伯氏认为应将其时代推迟到公元8世纪。

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图木舒克发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主要是在托古孜—萨莱(“九僧房”)发现的,包括仪轨供像和单独的雕像、浅浮雕和装饰建筑物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有佛陀、菩萨、天神、王公或下层世俗人、僧侣和苦修山僧等。其主体应断代为6~7世纪中叶。雕塑的主要原料是粘土和“柴泥”。其技术主要是模制。那里的壁画主要是用于装饰寺院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的。其中的杂物可分为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还愿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饰、骨制品、青铜或其他金属品、箭头、玻璃片、布帛和绳索、扫帚等)。它们现在均被入藏吉美博物馆。

四、伯希和考古探险团在库车绿洲的重大发现

经过在图木舒克的发掘之后,伯希和考古探险团于1906年12月15日离开那里,经阿克苏和拜城,向他们的另一个重点目标库车绿洲前进,并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他们一行在库车共勘察发掘了8个月,直到1907年9月3日才离开那里向乌鲁木齐前进。早在该考古探险

团离开法国之前，他们就听说了有关库车“明屋”（Ming - uī, Ming - oīg, 千佛洞），洞中覆盖着 7 ~ 10 世纪的壁画，而且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均已先期光顾过。但由于先前几个外国探险团都过分地专注于“千佛洞”而忽略了几座露天寺院，伯希和一行最终在那里发掘到了一大批木雕、印鉴、钱币、涂漆与绘画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写本，特别是在一座寺院的院子里发现了很多用被称为“婆罗谜”文的印度字母书写的写本。它们都被运往了巴黎。

在此期间，瓦杨博士测绘了库车绿洲的一幅平面图，努埃特拍摄了克孜尔千佛洞的大量照片，伯希和本人又亲自去考察了库车以北那条过去将裕勒都斯河（Youldouze）与帖克斯河（Tékēs）联系起来的通道。

伯希和一行到达库车时，德国考古探险团已经离开。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俄国考古探险家贝勒佐夫斯基，并与之保持友好关系。一直到 1907 年 4 月间，伯希和一行都停留在库车周围地区。后来，伯希和制订了自己的考察纲领：踏勘和研究库木吐拉千佛洞，这批佛洞开凿于木扎提河（渭干河）左岸的雀离大山山口的崖壁上；考察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 - Âqour），那里有在木扎提河以西平原中建造的寺庙遗址；然后再前往苏巴什（Soubachi），那里有数座寺庙和寺庙遗址，它们一直延伸到即将流出大山的库车河两岸。根据这项计划方案，伯希和一行于 1907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22 日在库木吐拉停留；然后又交叉地发掘了都勒都尔—阿乎尔（4 月 17 至 8 月 5 日），绘制了一幅考古遗址平面图，发掘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写本，特别是早于 9 世纪的梵文和婆罗谜文写本或木简，此外还有供像遗物和木雕像、各种钱币、各类装饰物。但伯希和在这里的最满意的发现物，还是获得了那些死文字的写本。他于 6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此感到了满足，因为我获得了丰富的写本文献。”他们一行于 6 月 10 日至